

当代 文学 研究 丛刊 · 5

● DANG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阎 纲
副主编 张 钟 蒋守谦
编 委 毛承志 刘锡庆 陈骏涛 吴重阳 张 钟
张 炯 郑 榕 阎 纲 阎青山 郭志刚
谢 冕 蒋守谦 蔡 葵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

第 六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 印张 253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5,200 册

统一书号: 10190·187 定价: 2.20 元

近年诗歌：一个简单的轮廓·····	谢冕 (1)
命运的转折·····	何西来 (24)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评长篇小说《故土》·····	张同吾 (47)
论孙犁的散文艺术·····	郭志刚 (58)
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	赵俊贤 (77)
战士行列里的歌手·····	周岩 于丛扬 吴开晋 (95)
——谈李瑛反映部队生活的诗	
一位诚实的作家·····	洪珉 (111)
——浅论叶文玲的小说创作	
从生活深处发出的声音·····	李星 (125)
——论峭石近年来的小说创作	
青春时代的咏叹·····	李书磊 (139)
——贾平凹小说创作概观	
评王安忆的中篇小说·····	陈娟 (151)
江水滔滔·····	沈泽宜 (161)
——评李杭育的小说创作	
南方的岸在何处? ·····	宋耀良 (175)
——给易杰送行的话兼评《南方的岸》	
革新及其限度·····	洪子诚 (187)
——谈部分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	

从王蒙近作的得失看文学创新的客观规律·····	李幼苏(204)
读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	潘亚墩(216)
舒婷论·····	王光明 唐晓渡(221)
论舒婷诗歌创作的倾向·····	雨 石(242)
关于作家世界观与生活艺术观的思考·····	贺兴安(257)
对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评价·····	范际燕(267)
新中国文学纪事和主要著作年表(六)·····	仲呈祥(298)
稿约·····	(337)

近年诗歌： 一个简单的轮廓

谢冕

一、历史的简单回顾

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九四九年。这与其说是取决于革命在全国建立了统一而巩固的政体，勿宁说，是由于决定诗歌性质的最根本原因——社会生活起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世代相因的思想方式，其根本应是人的精神素质的改变。

但这个诗歌分期的历史，似乎还应当追溯到更远一些，即是一九四二年。那年在延安举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文艺座谈会。可以说，当代诗歌的“设计师”，是那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的指引下，出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雏型：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代表的解放区诗歌，以及在《讲话》和解放区诗歌影响下产生的以《马凡陀山歌》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区诗歌。一方面，诗歌记载并讴歌了革命所带来的史诗般的变革，从而成为社会变革中的史诗；一方面，诗歌勇敢地肩负起干预生活的重任，它鞭挞生活中的倒退和黑暗，从而成为向着旧社会宣战的诗

的檄文。它们组成了在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领导下的诗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即通常被我们的文学理论著作称之为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这个传统好比一棵大树，有两个分枝：一个是颂歌，一个是战歌。

截至一九七六年“四五”之前，共和国诗歌将近三十年的发展，基本上都是试图沿着这条现实主义的航道前进。其根本性的特征就是，认为诗歌应当反映现实生活的革命性发展，时代的精神面貌应该在诗中得到体现，从而鼓舞人民向着革命的目标奋斗。诗人们为了实践这个目标，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也经历了重大的挫折。这些挫折大体上是：建国初期，有过生硬照搬革命词藻以为就是诗歌为现实服务的标语口号化倾向；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的图解现实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百花齐放方针提出以后，对于社会主义的萌芽状态的错误进行批评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这种后果最终导致了相当多的诗人回避现实矛盾、以及愈来愈普遍的粉饰现实倾向）。至此，现实主义诗歌大体上只保留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颂歌。这些颂歌因包括了不应歌颂的内容、和未能包括歌颂以外的内容而表现为明显的不健全。这方面，特别表现了对于现实生活负责的批评性主题的职能的萎缩。因而，这样的现实主义诗歌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全的、有时（主要是十年动乱时期）则表现为虚假的。

现实主义在现实生活的挫折促使诗歌另求它途。恰好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大挫折之后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这一运动以人民摆脱贫穷的真诚愿望为动力，而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为基础形成的“共产风”，使当时号称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实质是中国式的浪漫主义诗歌应运而生。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反拨，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始，成为主要的诗歌

潮流风靡达二十年。浪漫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整个时期，现实主义并未断流。不过是，它只表现为一股微弱的力量在延续着。成为基本的和主要的潮流的，是浪漫主义。

与此同时，过去十分重视的现实生活在诗中的地位急剧地下降，现实生活变成了仅仅是充当抒发革命精神的媒介物。这就是从六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后期的浪漫主义诗歌。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随着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畸形发展，当代诗歌的优良的颂歌传统在六十年代后期发生了病变：真实的人在充满迷信色彩的颂诗中失去了独立和尊严的自我。这就是受到扭曲的颂歌传统。

同样，由现实主义派生出来的战歌传统，也在这一股浪漫主义潮流中改变了形象。诗歌完全被征用来为随着各式各样的政治风向而转换名目的“阶级斗争”服务：从“斗走资派”、“批儒评法”，到“批投降派”、“反右倾回潮”。它们同样地均是与生活实际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没有联系的飘在空中的存在。

当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终于中断。经过了十年的政治动乱，人们惊呼：中国没有诗歌！当这场动乱结束，人们惊魂初定，这才以醒目的标题追记了这段诗歌灭亡的事实：一九七八年一月，邵燕祥执笔写《中国又有了诗歌》，在那里，他以悲愤的声音表达他的信念：

还我笔，还我歌喉，
我要唱人民的爱憎，革命的恩仇！

一九八〇年，沉默了很久的女诗人郑敏，在香港的《秋水》发表《诗呵，我又找到了你》，表达的是曾经有过的死灭，以及诗的再生的欣悦：

我吻着你坟头的泥土，充满了欢喜
让我的心变绿吧，我又找到了你……

从一九七六年“四五”到一九七八年底，经历了大约三年的恢复，诗歌的复兴已见端倪。

建国以来形成的诗歌为现实服务的观念，以及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形成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虽屡经挫折而仍然呈现着它与中国现实血肉相结的生命力。当代诗歌在十年内乱中的窒息，乃是现实主义诗歌无以弥补的损失。

二、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诗歌 为恢复真实性的努力

人民曾对变异的诗歌极为冷漠，因为它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无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出现。需加辨明的是，这一“诗歌运动”，并非纯诗的运动，它带着当代诗歌发展中的一般规律，即诗歌对于政治的依附。从基本特征看，它是一次完全自觉的以诗为武器进行政治斗争的行动。从诗的角度看，它以表达了人民的憎爱的真情而唤回了它的真实性的生命。在人民的生活中，在人民对于时代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中，诗已成为一个切实的行动。“四五”作为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兴与再生，对新诗现阶段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宣告：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已经开始。

许多文章都描述过中国新诗队伍在新的时代召唤下的又一次大的会合。这次会合不再有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那样的欢快气氛，而是不无悲凉情致的生者为死者的大集聚。诗歌队伍重新

集结之后，显示其战斗实力的第一次“实弹射击”，目标指向伪音与矫情。

一般认为，这是一个显示实力的要求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的抗争。所谓的现实主义精神，按此时的理解则是抛弃“假、大、空”，提倡诗要说真话。艾青是举着“红旗”重现在读者而前的，旗上写着两个大字：真话。艾青给他复出之后的第一本诗集《归来的歌》加的一篇序文，题目便是：《诗人必须说真话》。这是艾青对诗作出的最新的宣言，它是一篇声讨诗中的假话的檄文。艾青鄙薄那些“象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的诗人，他呼吁：

诗人必须说真话。……人民不喜欢假话，那怕多么装腔

作势，多么冠冕堂皇的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

随后，艾青又写了一篇题为《新诗应该受到检验》的文章，继续向着诗歌中的虚伪宣战。公刘以《诗与诚实》为题，对诗发出同时的召唤，他指出：诗也面临着“信用危机”，“不少诗作不说真话，或者说，不替老百姓说话。”公刘说，“诚实无罪”。

诗歌复活之后，几乎全力以赴地荡涤诗中的谎言，鲜明而响亮地提出了对于诗说来原不是问题的“真话”与“诚实”，甚而成为诗歌界一致的呼吁。这是一种基于对历史的沉重反省、其中当然包含了深刻的批判意识。人们对那些在政治动乱、经济凋蔽、正常生活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唱着“形势大好”的诗歌，感到了厌恶。他们要求不再隐瞒生活中的阴影，希望这些说真话的诗歌成为撒在生活的巨大伤口之上的“带韵的盐”，而不再是精神的迷幻药。

在这样深刻检讨过去的背景下，新诗的确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机。诗人的社会使命感重新得到确认。建国以来诗歌楔入生活再现和反映现实的传统，获得了全新的体现。这个时期的诗歌总的特点不单是奋发，更为贴切地说，是对于历史的沉思之

后，面对现实生活的沉重而发出的激愤之音。

黑夜刚刚过去，曙光是突然来临的。诗人的笔下不能不留下那一片阴暗，以及透出云层的熹微的光线。但在最初，更多的是对于阴暗的控诉和诅咒。公刘写过《雪景》：大雪后，“连垃圾都变成了纯洁的一堆”，妈妈告诫孩子：“不许你用脏鞋底破坏了它的完美”。孩子用手指头对着窗玻璃画了一个“愚顽的妇女”。已经觉醒的诗人，不能容忍再用假话来复盖历史残留的那一堆垃圾。

以画著称于世的黄永玉，曾在黑暗年月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斗室里画着窗户，窗外是明媚的阳光和美丽的迎春花。他以对春天的向往坚持度过黑夜的时光。等到春天真正降临，他却变成一位充满激愤的诗人。他以特有的辛辣和机智的讽刺崛起于诗坛，他唱的是那些年月让人哭笑皆非的痛苦。在诗中，他擅长的似乎不再是画纸上那些闪着金色光晕的墨荷，而是华君武式的诙谐和让人坐不住的讽刺力量。他从变态的生活中获得那些荒谬的令人发笑的画面。他的诗的力量，在于让人要笑还来不及笑的时候就感到了刺心之痛。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对那个变态的时代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诗人讽刺为了抹平皱纹而擦了过厚的粉的老太婆，她一笑，“碎瓷般的粉块的的嗒嗒掉在人们眼前”，诗人发挥说，

讨厌的是世界上

有一种叫做“记忆”的东西，

它总是不给擦粉的老太婆

留点情面。

黄永玉的诗，就是这种“讨厌”的“记忆”。他忠实于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历史的记忆，他写了一篇又一篇“不给擦粉的老太婆留

点情面”的诗篇。值得庆幸的是，在一个美好的年代，这些诗篇获得了时代和人民的奖赏。一位在画中表现出诗美的诗人，此刻在诗中，却成为画出了现实的丑陋的画家。但就是这种难以忍受的丑陋，要比那些在发展的生活表面涂抹“亮色”的伪善、伪美更有价值。

艾青提倡讲真话，他并没有黄永玉那样率直的揭露。他似乎不愿具体描述那些肮脏的“记忆”。他也有对于历史的思考，但更乐于作超脱的俯瞰。对照那些失去光明的日子，他唱《光的赞歌》。他眼中不是没有阴影，但他更显得空灵洒脱。人到晚年，感情更有节制。《我爱这土地》式的强烈，《大堰河——我的保姆》式的奔放，如今，都化为了哲学家般的冷静：

我们从千万次的蒙蔽中觉醒
我们从千万次的愚弄中学得了聪明
统一中有矛盾、前进中有逆转
运动中有阻力、革命中有背叛

甚至光中也有暗
甚至暗中也光
不少丑恶与无耻
隐藏在光的下面

他几乎不对现实生活的实际发言。他甚至更愿把这种实际的感受概括为富有哲理的意象。他从那些失去常态的生活里看到许多丑恶，但他并不象黄永玉那样作出惊世骇俗的刻画。他更多地把它化作了哲学的思索和抽象，通过这种概括表现出他成熟的机智。

从总的方面看，对于历史的反思正在成为诗歌现实性增强的

重要标志，这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原来相当疲软的诗歌的社会批判能力。这种能力的增进，改善了诗歌的能动性，从而在较高的水平上对社会进步起促进作用。相当数量的诗篇在历史性的反思中，对动乱年代的野蛮和残忍作了尖锐的揭露。这方面的主张，由于张志新事件的披露而达到高潮。“只因一个弱女子的从容死去，沉重的中国大地飞速地转动起来了……只因敌人在你身上拨动了一根琴弦，使九亿人心头不可抑制地回响起复仇的大音”（毕朔望：《只因》）张志新事件使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中国都陷入痛苦的沉思，人们被这种罕见的失去良知惊呆了。一个普通的女共产党员，不是死于敌人的屠刀，而是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这丑行使全中国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呼喊：

中国呵，中国！

中国被人割断了喉管！

（公刘：《呼喊》）

这一声声呼喊，显示了诗人正在行使自己失而复得的为人民代言——当然是“说真话”的权力。

张志新之死成为火种，它点燃了人们探讨民主与法制的热情。许多诗篇以此一事件为契机，引发了对于生活弊端当然主要是动乱的十年的生活的思考。思考它如何发生，以及如何避免，如何使我们能够生活在更为正常的环境中。当沉默的张志新走向刑场的时候，诗人在反思现代中国的愚昧（这当然是指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愚昧）：“最高权力的继承可以写进党章，这和‘巴黎公社’的原则相距多么遥远！”“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渎神而判处死刑，二十世纪的中国竟会出现中世纪的奇冤。”（白桦：《复活节》）这类诗篇中，最为人们知晓的是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它

参加了这个对于民主与法制的一致的呼吁，同时又在另一个侧面启示了诗歌的发展。

诗歌在大步走向真实和真诚。人们不再在诗中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也不再在诗中无限度地美化自己，而是袒露真情和真心。我们读到了因哭张志新的悲烈而转向哭自己的怯懦的诗篇：

不装哑就必须学会说谎
想起来总不免暗哭一场
哭自己脑子里缺少信念
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

（流沙河：《哭》）

我们也读到了由烈士的死而转向自我谴责的诗意：“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象黄继光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我惭愧我自己，我是共产党员，却不如小草，让她的血流进脉管，日里夜里，不停歌唱……”。（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在过去，我们也有过忏悔的诗，但多半不是在平凡的“小草”面前的愧疚，多半只是在神圣面前的谦卑和自惭形秽。如今这种真诚的忏悔之感，是在对于历史的反思之后转向自我的反省，是充满时代感的。更为主要的，由一个异常时代的终结所给予的启示，围绕着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之死发出的哀音，毕竟推动了诗歌思考主题的发展，形成了现阶段诗歌关切现实生活的新局面。过去受到禁锢的领域得到开放，诗歌的触角伸向了与人民的利益与权力密切相关的颇为敏感领域。

前此的诗歌，对现有生活的颂扬几乎等于诗歌的全部主题。现阶段诗歌出现了明显的逆转。诗歌的形象有了改变。群众对诗的冷漠心情开始消失。诗歌再变在人民中建立了信誉。

三、沉思与呐喊——时代赋予的使命

经过一个灾难性的年代，全中国都陷入了思考。“既然历史在这里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这是成年人对于历史的思考；“在灰色的夜空前，站立着一棵年青的树。它拒绝了幻梦的爱，在思考着另一个世界”，这是年青一代的思考。诗人的使命感在恢复。诗不再满足于牧歌式的恬淡清远，而是以充满激情进取精神，为消灭生活中的令人窒闷的阴沉而大声疾呼。于是出现了呐喊型的诗篇。

这些呐喊的诗，最直接地继承和发展了当代诗歌的求实精神。有一批诗人致力于这一类为生活的推进而发出的真诚的呼唤，他们关心社会问题远较披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尤为关注。他们把个人放置于客观世界中来表现，而不是如另外一类诗人那样把世界溶解于内心。

一些经历了生活忧患、曾经在政治浪潮中淹没的诗人，表现了更为动人的热情。他们淹没之时还年青，一旦浮了上来，仍然处于盛年，热情未曾泯灭。他们不象老年人那样冷静沉着，他们还不失五十年代那种对于生活的理想和信念，却又较比他们更为年青的一代少了点迷惘。这是更为多情的一代人。未曾泯灭的热情，把这些饱经忧患的诗人大体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前面述及的呐喊型，他们更为注重诗直接介入社会性主题；一种是沉思型，他们偏向于通过个人身世以间接地表现生活。后一类诗人，大体也有一个集中体现了特点的共同性主题，这便是：“归来”主题——归来之后的沉思，沉思自己的归来。

无论是呐喊还是沉思，他们都遵从复活之后的现实主义精神，说真话，抒真情。一部分人在生活的激流中奔涌呼喊，另一

部分人从激浪中站起，坐在布满礁石的岸上咀嚼狂涛激浪的凶猛，回想生活中的浮沉，有了更多内向的思索。

存在着多种性能的诗歌，有偏于浅吟低唱的，有偏于振臂高呼的。建国以来一种主要的诗歌形式——政治抒情诗，是振臂高呼一类，曾经起过好的作用。近年来还在兴起的对生活作直接观照的呐喊的诗，正是前述的诗歌传统的发扬。这类诗歌典型的是《将军，不能这样做》和《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政治抒情诗传统的继承。不过是，它恢复了真实性，使得它具有充满生命力的尖锐。

白桦、公刘、邵燕祥等近于此类。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声音和方式表达对于生活的热情。他们在旧生活结束、新生活开始的时候，都曾经以传统的方式欢呼和歌唱过。白桦歌唱过“如期归来的秋天”；公刘为宪法第十四条曾经写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唱过真诚的“恋歌”；邵燕祥归来的第一首诗是献给一座新建筑物的《献诗》。随后，他们逐渐觉察到自己的单纯，经过思考而终于为生活而呐喊。这种呐喊是对于因创伤而显得凝滞的生活的觉悟。

几代人都在沉思。呐喊型的诗人是沉思之后激情喷发的呼喊，而别样的诗人，则不采取呐喊的方式宣泄他们的热情，而仍然沉浸于思索。邵燕祥在这一辈诗人中算是年青的。他在五十年代是唱着青春之歌走向远方的。他的特点是对生活单纯的热情。在新的时代，邵燕祥的诗变得沉重起来，他不再有过去那种把中国架上汽车的单纯感。但他仍然为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仍然热情地召唤着前进。而在依然热情的歌唱中，他已经有了新的觉悟：“空话不能起动汽车，豪言壮语也不能铺路”，他坚信“我们一定能铺成一条高速公路，因为——

有这么多的痛苦
有这么多的愤怒
甚至有这么多的血肉
化为我们特有的混凝土！

（《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

他的“高速公路”竟然是由这样的混凝土所筑成，这是何等的悲凉！在这些诗人中，邵燕祥原是色调最为明亮的一位，他的诗中有着一贯的乐观感。他不是没有看到生活的沉郁，但他执着地认为，我们的“阳光、空气与水”理应属于我们，而不许被劫走：“我们是史诗的主人”。这是一位目光向着前面的诗人，当生活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就“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而不愿把阴影带进新的生活。即便如此，当他《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的时候，他还是留下了最后一声叹息，这就是：“我们有行乞的习惯吗？”

白桦以热情、积极、进取的姿态重新出现。他如同五十年代的郭小川、贺敬之那样，关心的是社会性的重大主题。他对风花雪月近于冷漠；也很少谈论自己的苦难，他总是把人民、民族、国家兴衰的思考写入诗中。他是一位离不开重大的政治性题材的诗人。歌唱了一个丰收的“如期归来的秋天”之后，他望见呼啸而来的春潮：“我是那样真切地感到了你的临近，我的血液和祖国的江河一起在转暖”。他的笔墨是节制的，他只是“感到了”春潮的“临近”，而没有进一步加以描述。这体现了诗人的成熟——一种中年人特有的审慎。随后，他的声音渐趋于冷静。新时期不少人写过各式各样的珍珠，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即珍珠的痛苦、的磨砺以及它在黑暗中的期待。白桦写的是一种显得特殊的珍珠，它几乎排除了对于个人命运的咏叹，他有一个更为宏阔的诗

思，那就是——三十年的总结，人民对于历史变迁的思考，结成一棵珍珠，它的名字叫“觉醒”。

白桦是呐喊的，他愿意站在生活的前头呼唤生活前进。要是说，《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是一声雷鸣，他的《眼睛》则是一道电闪——“中国的上空没有上帝，只有八亿双睁着的眼睛”。他总是这样写着重大的题目，这些诗的题目就是人民及其力量。即使这样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也不失对于历史的思考之后难以泯除的悲凉。那种即使是豪壮言辞后面的悲慨，几乎是同代人的诗作所共有的。他在《船》中以一种近于沉重的调子说道：

即使它们终于把我撕碎，
变成一些残破的木片，
我不会沉论，决不！
我还会在浪尖上飞旋。

即使是前进的船，也会有被“撕碎”的预警，这毕竟是令人不安的。我们当然愿意诗人们如同往昔，唱着乐观而豪迈的歌！然而，这不可能，因为诗的真实生命已经归来。

公刘唱过一些乐观的歌，很快即陷入“沉思”。沉思之后写出的诗章，都是富有哲理的深沉缜密之作。公刘动人之处在思想的深刻，这种深刻往往还藏着尖刺。经过离乱，他完全失去了当年那份吹着“叶笛”的牧歌情趣。他的诗很冷峻。他的抒情形象是一位始终皱着眉头思考的哲人。他也很少谈论自己的命运，尽管他们的命运也是坎坷的。他同样是一位以社会性的重要主题为诗的主题的诗人。一些我们不易引起警觉的普通现象，诗人却能引发为凌厉的批判，如《讨论会》，他抨击了那种只满足于空谈，却“谁也不去碰那个可怕的巨大的伤口”的现象。